

# 试论我国经济发展所处 的阶段及其对策

李春明

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其选择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并制定相应政策的重要依据。正确判别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对策,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 一、前人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论述及其启示

在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上,经济学家们对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作过许多有益的分析 and 探讨。这对于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特点,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当中,李斯特率先提出了以工业进步为中心内容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李斯特认为,从经济方面来看,国家都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阶段——畜牧业阶段——农业阶段——农业和制造业阶段——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阶段。上述五个阶段是依次递进的,后一阶段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前一阶段。并且,一国越是发达和越是完备,该国就越是文明和越是强大;一国的文明程度越高和实力越是强大,该国的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阶段便会越高。李斯特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强国,所以他论述的重心在于后三个阶段上。认为达到了处于第五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就会拥有最高的生产力,因而也就会最富裕。因此,处于农业阶段的国家,应当倾全力向农业和制造业阶段以及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阶段过渡。

德国经济学家罗雪尔在试图揭示国民经济发展规律时提出,国民经济发展或国民生活在机理上如同生物界一样,要经过幼年期、青年期(开花期)、成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衰老期)等四个发展时期。国民经济的成熟时期可以认为是最完善的形态,较早的形态不成熟,较晚的则又属于衰落的年代。鉴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生物进化的特征,罗雪尔认为任何国家都应当尽一切努力,促进国家最富足和最多样化发展时期尽早到来,并尽量延缓成熟形态的国民经济走向衰落的进程。罗雪尔进一步认为,在国民经济进化过程的四个时期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有三个,即外部自然、劳动和资本。他根据这三个要素在不同时期是否起支配作用这一原则为标准,把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国民经济的“低级文化阶段”。这一阶段劳动所作的贡献很小,自然占有着最重要的地位,甚至“土地几乎是一切”。第二个时期是随着手工工业的兴起和分工的发展,人类劳动逐渐上升到日益重要的地位。一个中间阶级在土地所有者和农

奴隶之间形成了。这一时期是第一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到了第三个时期，资本这一要素占据了显著优势。土地的价值由于大量资本的投入而获得极大的增长。在制造业中，因机器劳动压倒了手工劳动而更显出资本的重要。国民财富日渐增长，国民随之进入了最幸福的时代。

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按照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由捕猎人和牧羊人所组成的最原始的部落，是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氏族和部落经济阶段；当部落经济生活的重心转向马克公社或村落时，便开始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即马克公社和村落经济阶段。之后依次是城市经济、地域经济、国民经济、世界经济阶段。他认为，这种划分既表现为“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又有助于创造一种有关人类发展的完整理论。施穆勒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同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在总体构思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其区别在于他着力阐述政治结构、道德等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运用动态均衡的、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生活的本质，并将一国经济发展划分为“循环流转”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所谓循环流转阶段，指的是一种没有企业家、没有利润，不存在创新，也没有发展，靠经验和自由竞争自发调节，供给与需求相等，实现了静态均衡的简单再生产的自然经济。所谓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或者说是一个经济组织的形式，它是动态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现象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创新、新组合、企业家利润、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所谓社会主义，熊彼特下的定义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它不是由私人经营的企业，而是由公共权利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那种社会组织”。并将社会主义分为三种形式或阶段，即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变法前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吸收了上述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六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位，消费水平很低，存在等级制，家族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及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工业和农业中发生作用。三是起飞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妨碍不断成长的阻力已最后被克服，经济成长成为社会的正常情况。国民收入的约10%以上用于投资，新的企业家阶级扩大，新的技术在工业和农业中得到推广。四是向成熟挺进的阶段，现代科学技术普遍推广到各个经济领域，经济持续增长，新工业部门加速发展，部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国际贸易呈现巨大增长。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导部门转到耐用消费品方面。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个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服务业和环境改造事业。罗斯托认为，第三、六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两次“突变”，也是最有意义的阶段，“起飞”阶段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大分水岭，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一国经济要实现起飞，必须具有三个互相关联的条件：要有较高的积累率，要建立起能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要进行制度的、社会的、政治的变革。

前人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对于分析和研究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划分经济发展阶段意义重大。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有利于把握不同时期或阶段的特征，有利于掌握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第二，要运用多种参数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前人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有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有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有的从自然、劳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角度，有的综合考察一国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总体状况。这表明，判断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要综合考虑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

第三,要依据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制定发展对策。对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判断,目的在于根据本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选择适合本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盲目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作法,事实上很难取得经济的成功。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 二、我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

按照罗斯托的观点,经济起飞阶段意味着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它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阶段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当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满足了人们吃饭、穿衣等基本需要以后,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00美元左右时,经济的发展将出现一个新的跳跃。这个跳跃就是以满足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为目标,集中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加速工业化阶段,亦即经济起飞阶段或新经济成长阶段。据此判断,我国经济在经历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之后已进入起飞阶段,其各种基本特征已经或正在逐步开始显现。

第一,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并实现了由初步工业化向工业化中期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几年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主要任务是奠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经过4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加快发展,我国现已形成能源、机械、冶金、化工、电子等为主体、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粗钢、原煤、水泥、棉布、电视机的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化肥、化学纤维等也已上升到世界第二。到1996年底,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9.98%,第二产业为48.89%,第三产业为31.12%,工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根据判断一国工业化阶段的六大指标,我国制造业GDP在全产业GDP中所占比重、代表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贸易结构的比重,均已超过了工业化中期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实际汇率计算的人均GDP指标,大体处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水平;但就业结构即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差距。据此综合研判,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正与经济起飞阶段的特征大体相吻合。

第二,经济运行态势正在由波动型增长,向低振幅、高速度增长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50—1978年,工业及农业总产值各增长36.7倍和3.7倍,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2.9%和5.3%。1979—1995年,经济实际年均增长达到9.5%,比80年代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8%的速度快两倍以上。特别是1991—1994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更高达11.7%,大大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1.9%、发达国家年均增长1.7%,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5.3%的水平。所不同的是,在我国经济从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9个发展周期中,前些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都是在起大落落的波动型增长中实现的,而最近两轮经济周期则出现了低振幅的特点。出现这一特点,一方面是因为中央采取了正确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迅速转变的趋势,再加上新行业的入围企业多以非国有经济成分为主,它们支撑着经济整体上一直处于较高的发展速度,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据专家们预测,在行将展开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中,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但经济波动的幅度趋缓,开始进入平缓推进、高位整理的阶段。

第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强化,市场状况已全面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从80年代中期起,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逐步削

弱,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扩大。1984—1993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由123种减至54种,其产值比重降至11.6%;商品流通方面,国家计委统一平衡分配的物资由256种减少到22种;价格形成方面,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比重,在工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中为90%,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为85%,在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中为80%。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商品日益丰富。再加上近几年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市场供求总格局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部分商品的市场供应已满足或超过市场需求。据国内贸易部对609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排队分析,1997年上半年,市场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32种,占5.3%,大部分是农副土特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545种,占89.4%,供过于求的商品32种,占5.3%。全国433种主要工业产品,除甲级卷烟外,全都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部分商品已出现积压之势。这些都表明,现在我国的商品市场已摆脱了“短缺经济”的特征,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第四,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并由此推动经济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度化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迅速提高,物质生活迅速改善,并正从温饱走向小康,部分地区已向富裕迈进。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层次的转换,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消费支出的基本去向正从吃、穿、用为主的基本消费品逐步转向住宅、交通通讯及新一代耐用消费品;居民消费从追求数量满足为主要目标,转向逐步要求消费的质量和精度;居民的必需性支出比重下降,选择性消费比重上升。据最新统计,大消费结构中,居民购买食品类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逐步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6%降至1996年的54%,1997年非商品类支出开始增加。又据内贸部对全国百家大型商场的统计,1997年1—6月,吃的商品同比增长30.9%,穿的商品同比增长11.9%,用的商品同比增长30.9%。其中部分耐用消费品出现了超常规增长。据百家商场1—5月份的统计,大屏幕彩电销售同比增长116.8%,激光视盘机(VCD)增长10倍左右,滚筒式洗衣机增长1.6倍,微波炉增长1.84倍,电脑增长63.4%。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紧接着这一阶段性变化的,必然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并由此推动经济结构的高度化。

第五,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内国际市场由分割向融合转变,竞争态势由国内竞争向双重竞争转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型经济使国内市场彼此分割。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增加。1978—1995年,进出口国际贸易总额增长12.6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6.6%,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4.3倍和11.1倍,年均增长率各为17.4%和15.8%。同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系数(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重)由4.6%上升为40.4%,这表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明显加大。与此同时,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到1993年底,协议利用外资金额共为3137.8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为1355.66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714.0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542.19亿美元。1994—1995年利用外资继续增长,1995年末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达23.4万户,同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也有所发展。大量外资的注入,使得国际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没有被完全开发的市场,许多发达国家都把注意力放到占领中国市场上。这些对手凭借其资金、技术和经济策略等优势,抢占经济制高点,雄心勃勃,咄咄逼人。过去我们只有跨出国门才能感受到的激烈的国际竞争,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和外国厂商,就在我国国内企业的家门口搭起擂台,并由原来的以价格为主的市场竞争,转向了价格、品种、质量、品牌和服务的综合竞争,以此争夺国内市场,使得市场竞争空前激烈、日益复杂。

第六,经济增长的重点,正由基础产业向着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并重的方向转变。一国初步工业化阶段或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交通、通讯、能源、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开发与建设,既是现阶段加快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全面振兴一

国经济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多年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以数量为主的发展战略，无论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都是以数量增长为主，结果形成了大量低水平的轻纺工业加工能力和设备加工能力，并大大超过了基础产业的供给能力，基础产业总量表现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在经济起飞阶段，在人民生活由温饱型转向小康水平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入和支持。但是，由于大量低水平的加工产品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经济发展对先进机电产品的需求居高不下，在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呈现一定程度的过剩特征的同时，资金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必须在继续发展基础产业的同时，注重于发展支柱产业，以支柱产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其它部门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 三、起飞阶段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经济起飞是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对于某一区域（例如一个省或市）来说，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又是一轮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机遇，把握机遇，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找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为实现经济腾飞创造条件。

其一，制定与“起飞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是体现一国或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带全局性、规律性和科学性的规划。在不同时期，构成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局部（部分、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因而一国或一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会由于政治或经济形势不同而变化。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根据如前所述的情况变化，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也应实行相应的转变：从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建设规模，转变到主要立足于现有基础，把建设的重点放到现有企业的改造、充实和提高上；从主要依靠增加大量资金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主要依靠增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消耗，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主要依靠经济规模扩张，追求产值速度，转变到主要依靠结构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占有率。当前，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全国各省都在纷纷制订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例如新疆自治区的“一黑一白”发展战略，提出“产业兴，抓石油；农业兴，抓棉花”。又如山西省的“五柱擎天”发展战略，除继续以煤作为山西的“立省之本”外，又按照“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较快的增长速度、较高的技术起点、较好的经济效益、较强的产业带动性”的标准，确定了四大跨世纪带头产业，即焦化产业，特殊钢和铝为主的冶金工业，旅游产业和汽车工业。再如，云南省的特色经济发展战略，是按照“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充分发挥本省优势”的原则，重新确立了四大产业，即用新的思路发展“两烟”以及生物产业、矿产业和旅游业。它们都试图走出一条发挥优势加快发展之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之路、地方经济和全国经济协调发展之路。

第二，着力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之后，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愈益突出，其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基础脆弱，第二产业技术和效益不高，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产品结构不合理，低档次的产品多，高新技术的产品少；企业结构不合理，小企业多，大企业少；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大而全”、“小而全”及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为适应经济起飞的新要求，必须着力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一是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切实加强农业，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使第一产业不断加强。第二产业要调整和提高，特别是要着力振兴支柱产业，使之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不仅要继续发展商业和生活服务等传统产业，更要积极发展旅游、信息、技术服务、法律服务和会计服务等新兴产业。二是抓好产品结构调整，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状况，坚决压缩和严格控制生产那些高消耗、高用汇、低水

平和重复生产严重的产品,努力开发适应市场多层次需要的新产品和新品种,增产名牌优质产品和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尤其是增产适应农村需要的日用消费品,以及出口产品和能够替代进口的产品。三是抓好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下大力气解决好“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和分散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调整和宏观调控,将产业政策具体化到地区布局和对某些产业及市场的占有上,引导各地按要素特征确定地区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推动地区间开展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和有效联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同时,还要把结构调整同积极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从启动和开拓国内外市场入手,开辟新的消费热点,刺激社会总需求中的最终需求,以新的需求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三,着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经济起飞阶段,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速度同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基础上,既有较高的速度,又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全部经济工作纳入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提高经济效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进行:(1)向开拓市场要效益。产品畅销、价格合理、回报快,是取得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为此,结构调整要考虑市场需求,把市场作为调整结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发新产品也要适应市场需求,并通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企业营销活动要盯住市场,围绕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开拓市场的过程就是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2)向规模经济要效益。从经济发展的进程看,企业规模的扩大,大企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是现代工业的客观趋势,并且大型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创造更高的生产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规模大、技术高、牌子响、竞争力强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占据着很大优势,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更稳定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建立灵活高效的投融资机制,通过加快企业组织结构调整,通过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通过资本运营等途径,组建企业集团,获取规模效益。(3)向科技进步要效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凡是以技术为手段,并按科学规律去办,往往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好的效果,这就是科技出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必须不断强化技术开发和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必须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经济效益。(4)向科学管理要效益。管理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不可缺少的内在要素,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新的形势下,要不断拓展管理的外延,确立“大管理”的观念,实现管理制度的创新。不仅要抓好质量、成本、资金、营销、劳动、工资等基础性管理工作,而且要抓好企业在建立新的领导体制、新的监督体制、新的组织管理机构、新的决策程序过程中所必须的各项管理。通过企业苦练内功,切实推进企业的基础管理、专业管理、综合管理和现代化管理,全面提高企业整体素质,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其四,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步伐。经济起飞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及意识形态,因而必须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使之能适应经济起飞的要求。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特别是经过党的十四大以来5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立足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新的进展,运行机制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积极推进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已经步入新的轨道;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加大,政企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多方面促进对外开放,封闭的经济运行系统已被打破,开放而富有竞争力的城市功能正在形成。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显现出来。今后还必须在攻坚阶段加大改革力度,实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要立足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进一步改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采行各种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以确立国有资产

投资主体为重点, 加快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 促进政企分开; 要以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为重点, 推动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以发展资本市场为重点, 探索发展各种要素市场, 拓宽直接融资的比例和渠道; 要抓紧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以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为重点, 加大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力度;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 用法律手段巩固改革成果。

其五, 加大资本筹集的力度和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 资本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 必须通过多种渠道, 加大资本筹集的力度。但是, 需要明确的是, 当前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不能像以往那样依靠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来进行。改革以来, 支持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量资金, 在渠道上发生了如下三个阶段变化: 第一阶段是1979—1986年, 这一时期财政是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渠道; 第二阶段是1987—1994年, 这段时间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资金渠道, 由财政转向了银行, 投资政策上实行了拨改贷, 国有企业乃至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均依靠大规模的银行贷款而获得迅速发展; 第三阶段是1994年至今, 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资金增量不可能大幅增加, 而应通过其它途径筹集资本的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 除继续依靠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 依靠提高资本积累率和生产性投资等渠道筹集资本以外, 重点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 一是实施资本经营, 盘活资产存量, 资本经营就是用较少的自有资本支配较多的社会资本, 提高自有资产的渗透力, 从而以较少的资产投入得到较大的回报, 实现资本保值增值。当前要通过资本经营, 推动企业的兼并联合和破产, 实行资产重组, 盘活资产存量。二是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 通过组建股份公司以及股票上市、上柜, 实行直接融资, 也可通过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 从企业职工中直接筹集一部分资本, 以有效地促进消费基金向投资基金的转化, 扩大资本来源。三是通过扩大开放, 直接从国外吸引资金, 组建中外合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 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六, 着力维护社会的稳定。经济起飞阶段所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政治体制转轨, 必然要引起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 会触及到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因而必须十分注意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其中尤其要高度重视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 要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广开就业门路等途径, 切实解决好失业问题, 对涉及到群众利益调整的改革和发展措施, 工作要做细做好, 注意宣传舆论导向, 理顺群众情绪, 消除群众对有些问题的误解和疑虑; 要主动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在一些牵动全局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 注意及时处理好各种关系, 做好交叉部和联结环节的工作; 还要围绕群众切身利益多办实事, 缓解各种矛盾, 增强凝聚力, 从而促进稳定, 保持稳定, 为经济起飞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 注释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谭崇台主编:《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郑新立主编:《工业发展政策——比较与借鉴》,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潘岗文:《怎样看市场旺不旺》, 载《人民日报》, 1997-07-31。

郭吴新:《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载《湖北社会科学》, 1997(4)。

(作者单位: 湖北省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曾德国)